

家庭农场主个人禀赋对政府补贴获取的影响

——基于安徽 768 个家庭农场的调查

王丽霞

(安徽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 安徽 合肥 230031)

摘要: 基于安徽省 768 个家庭农场样本的数据, 运用 Probit 模型实证检验农场主个人禀赋对家庭农场获取政府专项补贴的影响。结果表明: 在控制了与政府补贴政策直接相关的政策变量、农场的个体异质性特征变量等一系列影响因素之后, 农场主个人禀赋差异是造成家庭农场的政府补贴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具体而言, 教育禀赋构成高层级政府补贴获取约束, 而家庭农场主具有的企业经营经验、农业生产经验、干部经历能够显著促进地方政府补贴的获取。

关键词: 家庭农场主; 个人禀赋; 政府补贴; 层级差异

中图分类号: F301.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17)05-0010-07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farmers' personal endowments on government subsidies: Based on the survey of 768 family farms in Anhui province

WANG Lixia

(School of Economics/Research Center of the Agriculture-Rural Area-Peasant,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data from 768 family farms in Anhui province, the impact of family farmers' personal endowment on government subsidies is analyzed by using Probit model. The study shows that after controlling a serie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such as the policy variable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government subsidy policy and the individual heterogeneity variables of the farm, the personal endowment difference of farmer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reasons for the difference of the subsidy of the family farm at different levels. In particular, the educational endowment constitutes the constraint of high-level government subsidies. However, the experience of business operati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or cadre experience that the family farmer own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probability of Attaining local government subsidies.

Keywords: family farmer; personal endowment; government subsidies; hierarchy difference

一、问题的提出

2013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 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 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 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随着家庭农场的快速发展, 众多文献阐述了政府补贴对家

庭农场和农业发展的影响。一种观点认为政府补贴对家庭农场和农业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1-6]。一是能够有效降低家庭农场建设初期土地转入过程中的费用, 促进土地流转, 扩大经营规模, 降低投资建设成本, 为家庭农场直接注入现金流, 提升偿债能力, 调动家庭农场主土地转入的积极性, 进而增加农民收入; 二是无论耕种面积多少、是否引进新技术, 农业直接补贴政策对农业劳动者的耕种行为都会起到一定的鼓励作用; 三是农业补贴政策可以缩小农村收入差距, 增加土地所有者和经营者收入。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政府补贴对农业发展的效果

收稿日期: 2017-06-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2CJY052)

作者简介: 王丽霞(1984—), 女, 安徽黄山人, 博士生, 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统计调查。

不明显。Gale 认为中国 2004 年起实施的粮食补贴政策在提高粮食产量、鼓励农民种粮积极性等方面效果不显著^[7]。一项针对上海松江模式的研究表明, 家庭农场的发展严重依赖于政府的财政支持, 应改变直补方式, 转为以市场为导向对农产品进行补贴^[8]。邹彩芬、林万龙、彭熠等人也认为, 针对农业企业的政府补贴往往以“专项补贴”为主, 未能发挥补贴的效率^[9-11]。另有学者认为农业补贴政策干扰了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发展, 缩减了农业产能空间及收入增长空间, 并因此主张取消农业补贴, 实现农产品贸易自由化^[12]。

有关家庭农场的政府补贴研究文献主要涉及经营主体行为和政府行为两方面。就经营主体行为方面而言, 尚旭东等认为农业生产的低利润使得多数大规模农地经营者的种粮收益主要依赖于国家种粮补贴和地方农地流转补贴^[13], 家庭农场更在意包括国家粮食种植补贴在内的各项补贴的获取^[14], 扩大土地流转规模和种植面积的目的在于获得更多补贴而非提升经营效率。就政府行为方面而言, 林坚等认为中国农业补贴政策尤其是粮食收购价格政策的目的并不是单纯为了农民增收, 而是为了应对粮食生产可能出现的较大波动^[15]。

已有文献充分阐释了政府补贴对家庭农场发展的积极影响, 但所有分析前提均为家庭农场已经获得政府补贴, 将农场获得补贴过程视为纯粹政策结果, 而忽略了家庭农场获得补贴过程存在的非政策随机因素, 尤其是农场主个人因素对补贴获取的作用。政府补贴的实际覆盖范围有限, 补贴存在着较大的地区差异和类型差异。《安徽农村发展报告 2015》指出, 家庭农场补贴的发放具有显著的差异性^[16]。即使对于同一地区、政策条件类似的家庭农场, 是否获得政府补贴情况以及获得补贴数额均存在差异, 甚至补贴来源的政府层级亦存在很大差别。这表明符合政策条件并非获得政府补贴的充分条件。基于此, 笔者拟从家庭农场自身出发, 分析农场主个人禀赋在获取政府尤其是不同层级政府的家庭农场直接补贴中的作用及差异。

二、理论分析与模型构建

政府补贴是由财政安排专项资金向经营主体

提供的无偿转移支付^[17], 其目的在于促使补贴对象发挥更高的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18]。政府的家庭农场补贴经济效应包括提升农场经营效率、促进技术进步、提高规模效率等, 社会效应则包括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土地规模化种植、防止土地抛荒及农村空心化等。家庭农场所获补贴往往来自于不同层级政府, 主要包括: 国家补贴、省级补贴、市级补贴和县级补贴。国家补贴主要是由中央财政和农业部直接发放的补贴, 其政策要求具有整体范围上的指导性和统一性, 补贴形式和补贴额度具有一致性; 其他各级补贴则是由各层级地方政府根据各地的实际发展需要发放的补贴, 具体补贴政策要求和具体的补贴形式及额度均存在较大差异。政府和补贴对象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19], 这些信息主要包括发展潜力、盈利能力和生产技术等决定家庭农场经济效益的因素。鉴于农业的弱质性导致的农业经济效益普遍较低, 基于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的综合考虑, 政府针对家庭农场制定的补贴政策往往倾向于具有更高社会效益的农场。考虑到国家粮食安全因素, 种植规模较大、以粮食种植为主的农场社会效益更明显, 从而更易获得政府补贴。

作为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家庭农场社会效益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场主个人的判断能力和决策能力。这种判断能力和决策能力往往建立在家庭农场主个人禀赋之上, 包括先天的要素禀赋和后天的经历及经验, 如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从业经历等, 各种禀赋(尤其是通过后天努力获得的禀赋特性)的线性作用或者交互作用均可能影响家庭农场对政府补贴的获取。人力资本理论指出, 人力资本同时具有的要索功能和外部性功能会以不同的形式影响人的行为, 人力资本水平不同的农场主存在的个人禀赋差异会对农场社会效益的发挥效果产生不同的影响, 进而影响到补贴的获取。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场主虽然获取资源的能力更强, 但同时也掌握着更高的生产技术, 在经营策略上往往从技术和效益的综合角度出发而倾向于更多地种植经济作物, 然而这与政府期望通过补贴粮食作物以获得更高的社会效益的出发点相悖, 因此农场主受教育程度高未

必能够提高补贴的获取概率。而具有农业生产经验和企业主经验的农场主,管理经验、资源调度整合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更高,其农场生产的多样化特征更明显、规模化程度更高,从而示范效应更好,更易获得政府补贴。

经营主体的政治身份及其与政府的联系也可能是其具有良好发展前景和社会声誉的一种显示信号^[20],与政府具有联系的农场主,可能通过非生产性寻租争取到更多补贴^[21]。中国的分权改革使地方政府具有很强的经济自主权和财政支配权,在缺乏明确的法律制度约束和规范地方政府的补贴支出的情况下,经营主体的寻租即成为可能。如果经营者与政府具有一定的政治联系,就可以利用其社会资本与政府部门进行更为有效的“沟通”^[22],从而更有可能获得相关部门制定的补贴政策的认可。作为新型经营主体,家庭农场主具有的政治身份,例如干部经历和党员身份等亦会有助于农场获得补贴。因此家庭农场主具有的个人禀赋中的政治特征会影响政府补贴的获取。

一般理论分析表明,农场主基于个人禀赋,或通过调整经营策略适应政府的补贴政策,或通过加强与政府部门的联系获得认可,以此增加补贴获取的可能性。除此之外,补贴政策条款及农场的个体特征同样对家庭农场的政府补贴获取起着重要作用,本研究将二者作为控制变量加以分析。政策因素方面,主要包括年平均土地流转租金、流转期限、作物种植类型等。地方政府制定补贴政策的目的是解决日益严重的农地抛荒问题,促进土地流转,并鼓励粮食种植。针对规模化生产经营主体的扶持政策往往以农场能够承担的土地流转情况为主要依据。例如安徽省合肥市制定的奖补政策要求“单个业主受让土地在200亩以上,流转租金在每年500元/亩以上,从事粮食作物生产,且流转期满5年”。另外,不同地区由于资源禀赋不同和家庭农场发展规模差异,地方政府制定的专项资金补贴政策要求亦有所区别。农场个体差异方面,注册资本、家庭成员数、年平均季节工需求、是否加入合作社、年人均纯收入等均对家庭经营绩效有一定影响^[23],作为农场经营的综合考核结果,亦可能对补贴获取产

生影响。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选取的农场主个人禀赋变量包括农场主受教育程度、企业经营经验、农业生产经验、干部经历。控制变量包括与政府补贴政策直接相关的政策变量和农场的个体异质性特征变量,政策变量包括种植粮食、种植规模、土地流转租金和期限;农场的个体异质性特征变量包括农场主的家庭成员数、年人均纯收入和农场的注册资本、季节工需求、加入合作社等可能影响农场经营状况的变量。

农场主个人禀赋在不同层级政府补贴获取中的作用可能不同,因此,本研究首先将所有样本混合进行基本分析,再根据补贴层级将样本分类处理。考虑到样本数量和计量结果的准确性,在分类处理中将获得国家补贴和省级补贴的样本合并(以下简称为高层级政府补贴),获得市级补贴和县乡级补贴的样本合并(以下简称为市县乡补贴)。这样处理的另一个理由是,国家补贴一般由中央财政直接拨到各省,由省级政府统筹安排并予以资金配套,因此与省级补贴具有很多共同特征,而市县乡补贴政策一般随地方资源禀赋而定,地域性特点更强,可以合并讨论。

本研究以家庭农场是否获得政府专项补贴为被解释变量,因此可采用二元离散模型进行实证估计。具体计量模型如下:

$$G_i = \alpha_0 + \sum \beta_j X_{ij} + \sum \gamma_k Z_{ik} + \varepsilon_i$$

其中, G_i 表示第*i*个样本的政府补贴获取的0—1变量,取1表示获得政府补贴,取0表示未获得政府补贴。 X_{ij} 表示农场主个人禀赋变量。个人禀赋变量是影响补贴获取的隐性变量,也是补贴获取存在随机性的主要差异来源。 Z_{ik} 为一系列描述农场特征的控制变量,包括与政府补贴政策直接相关的政策变量和农场的个体异质性特征变量。其中政策变量是补贴获取的显性变量,其作用结果往往具有确定性。 α 和 β 为待估参数, ε_i 为随机误差项。

在模型的选择上,考虑到影响补贴获取的因素可能存在一些与解释变量相互影响的不可观测变量,导致内生性问题,使得估计结果有偏,而Probit

模型可以很好地规避这类问题带来的影响,因此本研究选择 Probit 模型予以分析,同时辅以 OLS 估计和 Logit 模型对模型稳健性予以考察。

三、数据来源及其计量结果分析

1. 数据说明与特征描述

本研究数据来自 2016 年 8 月笔者所在课题组对安徽省家庭农场发展经营状况进行的专题调查。为保证样本的代表性,本次实地调查涉及安徽省 18 个县(区)50 个乡镇的 82 个行政村,家庭农场有效样本为 768 个。调查地既包含平原地区,也包含山地和丘陵地区,涵盖了各种地形地貌和农业种植环境。

从补贴的范围看,获得补贴的农场数量为 346 个,占比仅为 45.05%,未超过半数;从补贴数额看,补贴额度最少为 60 元/公顷,最高则达到了 15 000 元/公顷,其中部分补贴为一次性补贴。表 1 刻画了获得补贴农场和未获得补贴农场的农场主个人禀

赋差异。

从家庭农场主个人禀赋看,两类农场中具有显著差异的指标主要是农场主具有的经验,获得补贴农场的农场主中具有企业经营经验、干部经历、农业生产经验者的所占比例均显著高于无补贴农场,而受教育程度却低于后者,但其差异并不显著,且农场主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仅为 10.032 年,仍以初中、高中及中专学历为主;另外数据还表明具有农业生产经验的农场主也仅为 32.31%,超过六成的农场主曾从事的职业与农业毫无关联,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多数家庭农场经营启动资金来源于工商资本。从农场特征看,获得补贴农场的种植规模、注册资本、加入合作社者占比、种植粮食者占比、土地流转期限高于无补贴农场,其他变量均低于后者,具有显著差异的是种植规模、流转期限、种植粮食者占比。超过 7 成的家庭农场仍以粮食种植为主。

表 1 变量解释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获得补贴农场	未获得补贴农场	均值	Differ(t 值)
受教育程度/年		10.01	10.10	10.032	-0.8792
企业经营经验	有=1, 无=0	34.81%	27.62%	30.86%	1.6501*
干部经历	有=1, 无=0	24.72%	17.10%	21.74%	1.9912**
农业生产经验	有=1, 无=0	37.41%	28.14%	32.31%	2.2280**
种植规模/公顷	平均种植规模	60.328	35.477	40.573	1.6598*
家庭成员数/人		4.89	5.28	5.104	-1.0608
土地流转租金(元/公顷)	年平均土地流转租金	11 243.7	10 483.8	10 891.485	-1.650*
土地流转期限/年	平均土地流转期限	10.01	9.11	9.59	1.9697*
注册资本/万元		161.91	146.52	153.653	0.1924
加入合作社	是=1, 否=0	74.14%	64.19%	68.80%	1.4631
季节工需求/人次	年平均季节工需求	57.264	63.125	60.362	-1.0141
年人均纯收入/元		44 132.02	60 023.41	52 657.751	-2.5207**
种植粮食	是=1, 否=0	79.67%	67.85%	73.32%	2.2173**

注: *、**、***、分别表示 10%、5%和 1%水平下具有显著性差异。

表 1 直观地反映了有补贴农场和无补贴农场的农场主个人禀赋差异,为分析这种差异的可能原因,笔者进一步统计了具有不同禀赋的农场主经营农场的土地流转特征和粮食种植情况差异。从表 2 可以看出,农场主受教育年限在粮食种植情况中表现出明显差异,粮食生产型农场主受教育年限明显低于非粮食生产型农场,但在土地流转特征上无明显差异,这表明受教育程度高的农场主获得补贴概率之

所以偏低可能与粮食种植情况有关,与前面的理论分析一致。而具有企业经营经验和农业生产经验的农场主,农场土地流转规模、流转期限和流转租金超过平均水平的占比更高。即具有企业经营经验和农业生产经验的农场主获得比例偏高可以用其对于土地流转政策变量的影响解释,而与作物选择无关,但干部经历则难以与土地流转、粮食生产等政策变量建立关联。

表 2 个人禀赋与农场特征的差异比较

指标	受教育年限/年	具有企业经营 经验者占比/%	具有农业生产 经验者占比/%	具有干部经历者 占比/%
种植规模	60.328	9.95	32.48	22.630
> 60.328	10.079	33.82	43.28	11.760
流转期限	10.01	9.98	28.14	21.020
> 10.01	10.17	43.21	38.27	18.520
流转租金	10 431.64	9.97	27.33	23.600
> 10 431.64	9.92	34.86	37.14	16.000
种植粮食	是	9.76	29.03	20.788
否	10.33	30.00	34.13	17.140

注：60.328 公顷、10.01 年和 10431.64 元分别为获得补贴农场的种植规模、流转期限、年平均土地流转租金的平均值。

2. 农场主个人禀赋对政府补贴获取的影响

为克服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效应，本研究对变量中取值较大的变量，如农场规模、注册资金和年土地流转租金取对数后进行回归。根据 Probit 模型的回归结果(表 3)，在控制了政策变量和家庭农场个体异质性变量后，受教育程度变量显著为负，而企业经营经验、干部经历、农业生产经验等变量均显著为正。为避免回归结果偏误，进一步采用普通最小二乘估计和 Logit 模型回归(表 3)，结果与 Probit 模型的回归结果一致，表明所得结果是稳健的。

表 3 个人禀赋对补贴获取的影响

变量	Probit 模型	OLS 模型	Logit 模型
受教育程度	-0.037* (0.041)	-0.016* (0.015)	-0.076* (0.071)
企业经营经验	0.077*** (0.262)	0.004* (0.097)	0.050** (0.439)
干部经历	0.054* (0.269)	0.027* (0.013)	0.134* (0.534)
农业生产经验	0.340** (0.234)	0.137** (0.087)	0.630* (0.397)
常数项	1.158*** (0.191)	0.848*** (0.703)	1.593*** (0.188)
政策变量	√	√	√
个体异质性	√	√	√
准 R^2/R^2	0.103	0.162	0.129
LR/F	34.37***	12.21**	29.32**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分别表示 10%、5%和 1%水平下具有统计显著性。

实证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土地流转租金和期限、种植粮食及其他农场特征等政策变量和农场个体异质性后，农场主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场获得政府补贴的概率越低，而农场主具有企业经营经验、农业生产经验和干部经历的农场获得政府补贴的

概率越高。本研究实证结果支持当前一些学者的结论，如余明桂等以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的实证分析表明与地方政府有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更易于获得政府补贴，且补贴数额更多^[17]；Zheng 的研究表明，曾具有政府干部身份的经营者可能是经营主体具有良好声誉的一种信号显示机制，从而对其获取补贴产生有利影响^[20]。另外，拥有企业经营经验和农业生产经验者显然具有更广泛的社会交往，而经营主体是否拥有广泛的社会资本与其能否获取补贴紧密相连^[24]。本研究的结果揭示出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家庭农场亦不例外。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农场主受教育程度越高往往意味着获取资源的能力越强，但这类农场由于更少选择种植粮食作物，获取补贴的可能性却越低。

3. 农场主个人禀赋在不同层级政府补贴获取中的作用差异

笔者运用 Probit 模型比较两类层级补贴获取的差异性，并辅以 Logit 模型进行稳健性分析。实证结果见表 4。

根据表 4 的结果，受教育程度变量在所有模型中系数均为负值，但仅在高层级政府补贴获取模型中显著，企业经营经验、干部经历、农业生产经验等变量在所有模型中系数均为正，但仅在市县乡级补贴模型中高度显著，Logit 模型辅助回归的结果与 Probit 模型符号一致，表明实证结果是稳健的。表 4 反映出农场主受教育程度形成高层级补贴获取约束，而企业经营经验、干部经历、农业生产经验正向影响地方层级政府补贴获取。这是由于高层级政府针对家庭农场制定的补贴包括两类：一是农业生

产基础性补贴,其补贴对象主要为粮食生产家庭;二是家庭农场专项补贴政策。前者的实施以是否种植粮食为依据,后者则以方向性指导意见为主,具体落实措施由地方政府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场主学习农业生产技术的能力更强,倾向于选择附加值更高的经济作物,而种植粮食作物的比例少,因此获得高层级政府补贴概率低;拥有企业经营经验和农业生产经验的农场主的抗风险意识更强,倾向于流转更多土地,且土地租期更长,从而较契合地方政府政策要求,能较好获取地方政府的补贴;干部经历尽管能够帮助农场主与政府部门保持政治联系,但从事农场经营的农场主的干部经历多局限于基层干部,很难与高层级政府建立直接联系,因此仅在市县乡政府补贴获取中发挥作用。

表4 个人禀赋在不同层级政府补贴获取中的作用差异

变量名称	高层级政府补贴		市县乡补贴	
	Probit 模型	Logit 模型	Probit 模型	Logit 模型
受教育程度	-0.059** (0.037)	-0.1021** (0.0641)	-0.001 (0.031)	-0.002 (0.051)
企业经营经验	0.068 (0.211)	0.165 (0.369)	0.306*** (0.182)	0.054*** (0.299)
干部经历	0.184 (0.240)	0.331 (0.417)	0.203*** (0.209)	0.336** (0.342)
农业生产经验	0.313 (0.203)	0.521 (0.357)	0.094* (0.173)	0.152* (0.283)
常数项	0.119* (0.617)	0.233* (1.068)	-0.625 (0.464)	0.996* (0.757)
政策变量	√	√	√	√
个体异质性	√	√	√	√
准 R^2/R^2	0.0684	0.0682	0.0619	0.0612
LR/F	32.89***	31.31***	25.32**	24.63**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分别表示10%、5%和1%水平下具有统计显著性。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针对政府的家庭农场补贴的覆盖范围有限,补贴额度存在差异的现象,本研究运用调研数据实证考察了家庭农场主个人禀赋对补贴获取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在控制了与政府补贴政策直接相关的政策变量、农场的个体异质性特征变量等一系列影响因素之后,家庭农场主教育禀赋构成高层

级政府补贴获取的约束,即负向影响补贴获取的概率;第二,家庭农场主具有的企业经营经验、农业生产经验和干部经历能够提升市县乡级政府补贴获取概率。本研究从三个方面给出了解释:第一,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农场主在种植产品的选择上倾向于回报率较高的经济作物,而不太愿意种植哪些作为补贴发放重要政策依据的粮食作物,从而致使获得补贴概率更低;第二,土地流转情况是政府制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补贴政策时考虑的重点,而农场主具有企业经营经验和农业生产经验的农场因为流转土地规模更大、租期更长而更易于获得补贴;第三,具有干部经历的农场主通过寻租行为与政府保持一定联系,从而更易获得地方政府补贴。

基于上述结论,本研究得出如下几点启示:一是应鼓励高学历劳动者从事家庭农场生产,可以促进经济作物发展、提升土地资源附加值、提高农业产出,达到逐渐弱化政府补贴功能和减轻财政负担、促进农场自生能力提升以推动家庭农场长远发展的目的。二是地方政府补贴的土地流转规模偏好意味着获得补贴的家庭农场承担了较多政策性负担,尤其是那些具有企业经营经验的农场主往往被政府赋予过高的期望值,政策性负担将可能导致这些家庭农场难以摆脱受补贴的局面,长期而言,将可能导致农场经营风险增大,对农场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竞争力带来不利的影响^[25]。第三,规范并简化地方政府补贴政策的执行流程,加大监督力度,通过各种渠道使政策信息透明化,避免发放过程中产生寻租行为,是保证补贴公平性和有效性的必要措施。

参考文献:

- [1] 陈飞,翟伟娟.农户行为视角下农地流转诱因及其福利效应研究[J].经济研究,2015,50(10):163-177.
- [2] Hennessy D A. The production effects of agricultural income support policies under uncertainty[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998, 80(1):46-57.
- [3] 马彦丽,杨云.粮食直补政策对农户种粮意愿、农民收入和生产投入的影响——一个基于河北案例的实证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2005(2):7-13.
- [4] 王姣,肖海峰.我国良种补贴,农机补贴和减免农业税政策效果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7(2):24-28.

- [5] 钟甫宁, 顾和军, 纪月清. 农民角色分化与农业补贴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江苏省农业税减免、粮食直补收入分配效应的实证研究[J]. 管理世界, 2008(5): 65-70.
- [6] 王亚运, 蔡银莺, 朱兰兰. 农业补贴政策的区域效应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湖北省武汉、荆门、黄冈等典型主体功能区为实证[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1): 8-16.
- [7] Gale H F, Lohmar B, Tuan F C. China's new farm subsidies[R]. Economic Research Servic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Outlook Report, 2005.
- [8] 邵平, 荣兆梓. 家庭农场财政补贴政策效用研究——以上海松江模式为例[J]. 上海经济研究, 2015 (9): 112-119.
- [9] 邹彩芬, 许家林, 王雅鹏. 政府财税补贴政策对农业上市公司绩效影响实证分析[J]. 产业经济研究, 2006(3): 53-59.
- [10] 林万龙, 张莉琴.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政府财税补贴政策效率: 基于农业上市公司的案例研究[J]. 中国农村经济, 2004 (10): 33-40.
- [11] 彭熠, 胡剑锋. 财税补贴优惠政策与农业上市公司经营绩效——实施方式分析与政策启示[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3): 86-94.
- [12] Lohr L. The importance of the conservation security act to US competitiveness in global organic markets[R]. Conservation Security Act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c Trade, 2001(5): 3-12.
- [13] 尚旭东, 朱守银. 家庭农场和专业农户大规模农地的“非家庭经营”: 行为逻辑、经营成效与政策偏离[J]. 中国农村经济, 2015 (12): 4-13.
- [14] 尚旭东. 行政推动农地流转的弊端及对策[J]. 山西农经, 2015(1): 12.
- [15] 林坚, 李德洗. 非农就业与粮食生产: 替代抑或互补——基于粮食主产区农户视角的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13 (9): 54-62.
- [16] 张德元, 李静. 安徽农村发展报告 2015[M]. 安徽: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15.
- [17] 王凤翔, 陈柳钦. 地方政府为本地竞争性企业提供财政补贴的理性思考[J]. 经济研究参考, 2006 (33): 18-23.
- [18] 余明桂, 回雅甫, 潘红波. 政治联系, 寻租与地方政府财政补贴有效性[J]. 经济研究, 2010, 45(3): 65-77.
- [19] Li H, Meng L, Wang Q, et al. Political connections, financing and firm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ese private firm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8, 87(2): 283-299.
- [20] Zheng Y, Zhu Y. Bank lending incentives and firm investment decisions in China[J]. Journal of Multi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2013, 23(3): 146-165.
- [21] Shleifer A, Vishny R W. Politicians and firms[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4, 109(4): 995-1025.
- [22] 吴文锋, 吴冲锋, 芮萌. 中国上市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与税收优惠[J]. 管理世界, 2009(3): 134-142.
- [23] 肖兴志, 王伊攀. 政府补贴与企业社会资本投资决策——来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经验证据[J]. 中国工业经济, 2014(9): 148-160.
- [24] 申宇, 傅立立, 赵静梅. 市委书记更替对企业寻租影响的实证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15(9): 37-52.
- [25] 张德元, 李静, 苏帅. 家庭农场经营者个人特征和管理经验对农场绩效的影响[J]. 经济纵横, 2016 (4): 77-81.

责任编辑: 李东辉